

试论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广州的关系

魏志江 / 中國 廣州 中山大學 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较为系统的研究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广东地区与孙中山护法政府展开的政治外交活动和二，三十年代国立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作为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人才养成基地和独立运动中心的意义，并探讨了韩国独立运动各主要政党，团体在广东地区所从事独立运动的主要活动，并分析了韩国民族革命党，韩国独立党和韩国国民党在广东地区势力的消长及其主要原因。此外，笔者根据有关档案记载和实地调查，对韩国独立党和韩国国民党广东支部在广州的办公地点进行了考证，并就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广州办公的政厅遗迹地进行考查，提出了初步的研究结论。

目录：绪论

一. 韩国临时政府初期与广东护法政府的政治，外交关系

1. 广州中韩协会的成立与韩国临时政府初期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2. 申奎植的广州访问与申，孙会谈的日程考证
3. 广东护法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外交承认的法理性问题

二.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中山大学与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

1. 国立中山大学的韩籍入学生
2. 国立中山大学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

三. 广州时期黄埔军校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

1. 广州时期黄埔军校的韩籍入学生

2. 黄埔军校韩籍入学生的独立运动

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主要独立运动政党、团体在广东的活动

1. 广州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的成立与活动

2. 朝鲜民族革命党, 韩国独立党和韩国国民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1) 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2) 韩国独立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3) 韩国国民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4)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向广州的移动及其关于遣返韩侨的交涉

结束语

附：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 韩国国民党驻粤代表金起元官邸与韩国临时政府在广州政厅遗迹地考

关键词：韩国独立运动 中国广东广州

作者简介：魏志江 男 江苏省淮阴市人 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
政务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历史学博士

绪论

广东省,地处中国华南地区,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摇篮和策源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东省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并发动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使中国广东成为二十世纪初东亚地区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孙中山领导的近代民主革命,也极大的鼓舞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运动。韩国,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的独立运动的革命家纷纷来到广东,展开民族独立运动。因而,近代广东地区的中国民主革命被赋予了东亚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色彩,也为韩国独立运动在广东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由于广东地区濒临港澳和东南亚,广东侨民侨居海外的华侨众多,大量的海外资金通过侨汇流入广东,因而为韩国各独立运动政党,团体在广东的活动和独立运动在广东的开展,提供了资金募集的有利条件。此外,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立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承担了为韩国独立运动培养政治军事人才的重要使命,也使国立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成为在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人才养成基地和独立运动的策源地,从而,为韩国独立运动准备了革命政治军事人才和组织条件。本论文首先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为了谋求出席远东太平洋会议,以外交手段实现韩国独立的目标,派遣临时政府代理总理兼法务部长申奎植访问广东护法政府作为研究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切入点,探讨申奎植与孙中山的会谈以及韩国临时政府与广东护法政府实现外交承认的法理意义;其次,论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指出国立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是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人才养成基地和独立运动活动中心;最后,探讨了韩国独立运各主要政党,团体在广东地区所从事独立运动的主要活动,并分析了韩国民族革命党,韩国独立党和韩国国民党在广东地区势力的消长及其主要原因。此外,笔者根据有关档案记载和实地调查,对

韩国独立党和韩国国民党广东支部在广州的办公地点进行了考证，并就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广州的政厅的遗迹地进行考查，提出了初步的研究结论。

一. 韩国临时政府初期与广东护法政府的政治、外交关系

1921年5月，中国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了参加远东太平洋会议，寻求中国广东护法政府的外交支持，于1921年9月特派遣国务总理兼法务总长申圭植以临时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广州护法政府进行国事访问，与孙中山进行了正式会谈，并决定建立广东护法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关系。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重大政治外交事件。本节主要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为寻求出席远东太平洋会议，力求以外交手段达成韩国独立的目标，因而与广东护法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背景，经过以及广东护法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问题进行分析。

1. 广州中韩协会的成立与韩国临时政府初期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重新划分了欧洲的版图，确立了所谓“凡尔赛体系”。为了解决战后远东和太平洋问题，讨论限制各国军备竞赛，1921年，在美国的倡议下，积极筹备召开所谓太平洋会议，以确立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声明，并主张以民族自决的方式实现殖民地国家独立。因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其主要独立活动即围绕着积极准备参加太平洋会议，以作为韩国独立运动的主

要奋斗目标。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对中国北方地区的韩国独立运动横加压制和取缔,因此,取得中国广东护法政府的外交承认,并要求护法政府支持韩国临时政府派代表出席远东太平洋会议,以协助韩国独立,就成为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主要的外交目标。因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东地区的韩国独立运动,即围绕着韩国临时政府与广东护法政府的外交交涉而展开。

首先,为了推动韩国临时政府与广东护法政府的外交,韩国临时政府特成立“对中国外交团”¹⁾,并积极筹组中韩互助社之类的组织。自1921年初开始,先后在各地出现了名为中韩互助社的组织。3月,在长沙和安徽安庆分别成立中韩互助社。4月,在汉口与上海以及云南,中韩互助社也相继成立。1921年5月,终于在上海成立了联络各地中韩互助社的全国性组织——“中韩互助总社”。²⁾而在广州地区中韩两方人士所成立的互助组织,是“中韩协会”³⁾。至于中韩协会的发起人以及协会章程,据《民国日报》载:“近有识者多人发起中韩协会,公推丁象谦,朱念祖,高振霄等草拟组织简章。昨经委员会通过八条如下:本会为中韩两国人民之组织,故定名曰‘中韩协会’(第一条);本会为谋中韩民族之发展,以互助为宗旨(第二条);本部暂设于广州,上海各处得设支部(第三条);入会人以男女国民为限,并须有普通知纳,正当职业,再经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始得入会(第四条);会费除发起人自行任担外,会员费分特别,普通两种,依其人之志愿定之(第五条);会务设毕衡,议事,干事,文书四部,每部得互选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其章则另定之(第六条);本简章如有未尽事宜,依议事部或发起人之提议得修正之。”⁴⁾发起人大会于1921年9月23日在广州图书

1) 见金正明编,《朝鲜独立运动Ⅱ》明治百年史丛书,第117—118页,东京,原书房,1967。

2) 关于上海中韩互助总社的活动,参见韩国裴京汉《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

3) 关于广州地区为何称为“中韩协会”而非中韩互助社,参见韩国裴京汉《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1页。

馆召开, 9月27日, 成立大会在文德路图书馆正式召开, 其成立《宣言书》谓: “我中韩两国以历史上地理上之关系, 休戚与共, 唇齿相依者垂数千年 …… 爰是集合同志, 组织斯会, 相与提攜, 共相扶助, 持正谊于人类, 跻世界于大同, 寸本亲善之精神, 用求互助之进步。”⁵⁾ 参与组织广州中韩协会的中方主要人士有朱念祖, 谢英伯, 汪精卫, 丁象谦, 高振霄, 张启荣, 蔡突灵等; 韩方主要有金檀庭, 金熙綽, 朴化佑, 孙士敏等。参加成立大会的中方主要人士有叶夏声, 丁象谦, 董余庆, 谢英伯, 周之贞, 张启荣, 黄璧魂等; 韩方主要人士有金奇济, 金檀庭, 李愚珉, 林勤, 孙士敏, 金熙綽, 朴化佑等。在中方人士中, 朱念祖, 叶夏声, 丁象谦, 高振霄, 谢英伯, 张启荣, 周之贞是广州护法政府“非常国会”的议员⁶⁾, 其中丁象谦还是亲韩反日派的代表人物⁷⁾。汪精卫当时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长, 是护法政府的中心人物之一。中国方面这些众多的国会议员在后来的“非常国会”中, 为力争通过韩国独立提案, 支持韩国参加太平洋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 中韩协会成立后, 其会员很快发展到了数百名⁸⁾。其主要活动是发行机关刊物《光明》杂志以及开展与太平洋会议有关的宣传活动。作为中韩协会的机关刊物《光明》, 是由在中韩协会筹备过程中, 中方起主导作用的谢英伯利用其担任《广州日报》社长的条件⁹⁾, 从中韩协会成立开始,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 于1921年12月1日创刊发行的。因而月刊《光

4) 《民国日报》1921年10月4日。

5) 《中韩协会宣言书》, 载《光明》第1卷第1号。《光明月报》社, 1921年12月1日。

6) 《护法国会议员姓名录》, 《民国人物大辞典》, 第1694—1697页。

7) 当时, 日本高等警察报告到: “安徽出身的国会议员丁象谦, 从在上海时起就对韩国。临时政府予以同情, 是一名排日思想家, 到广州后, 与国会议员朱念祖, 叶夏声, 高振霄, 谢英伯, 张启荣及军政府主要人士徐谦, 汪精卫等筹备排日行动, 这期间与临时政府外交部员金檀庭见面, 成立中韩协会。”见《朝鲜独立运动Ⅱ》, 第468页。

8) 《中韩协会的发展》, 《独立新闻》1921年11月11日。

9) 《中韩外交史话》, 重庆, 东方出版公司, 1942年。(下略) 第34页。

明》杂志成为广州中韩协会独立的宣传工具。《光明》创刊号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的立场,撰文阐述对独立运动的见解,并推动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其执笔者大部分是中国人,其中林森,陈公博,包惠僧,汪精卫,叶夏声等都是当时在护法政府中发挥过主导作用的中心人物。中韩协会还采取了一些与太平洋会议相关的活动。1921年11月末,中韩协会即致电美国政府和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要求解决韩国独立问题。指出所谓《韩日合并条约》,为日本以胁迫手段迫使韩国订立,无国际法效力,应予撤销,并请求太平洋会议研究解决韩国问题,“三韩国脉,或得赖以中兴,敢以恢复韩国问题,望诸列国,尤望者中美两国,深愿各代表准据法理,依照条约,主持公道,率先建议,俾该项问题得有正常之解决,岂惟全韩二千万同胞衔结无既,东洋永久和平,实攸赖焉。”¹⁰⁾此外,中韩协会还致电出席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请求中国代表“将韩国独立问题提出会议,请求各国主张公道,并准韩国代表列席陈述意见,俾该问题得正当之解决。”¹¹⁾

此外,为了通过参加太平洋会议,以谋求韩国独立,韩国临时政府将与孙中山的广东护法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寻求护法政府支持韩国出席太平洋会议作为实现韩国独立的主要外交目标。韩国临时政府为谋求广东护法政府的外交承认,特派遣代理国务总理兼法务总长申圭植一行访问广东护法政府,寻求护法政府的外交支持。为了配合申圭植一行访问广州,临时政府特派遣外交部特派员金檀庭与长沙中韩互助社韩方主要代表人物李愚珉作为临时政府的代表来到广州,积极主导推动中韩协会的成立。根据韩国裴京汉先生的推测,广州中韩协会的成立,很可能是作为申圭植访问广州的准备工作而被计划并实行的¹²⁾。而申圭植一行对广东

10) 《中韩协会致太平洋会议电》,载《光明》第1卷第1号。《光明月报》社,1921年12月1日。

11) 《中韩协会致华府会议中国代表电》,载《光明》第1卷第1号。《光明月报》社,1921年12月1日。

12) 参见参见(韩国)裴京汉《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护法政府的访问，是韩国临时政府在广东地区推动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步骤。

由此可见，广州中韩协会的成立，实际上是为了配合韩国临时政府特使申圭植的广州访问而组织的，在远东太平洋会议即将召开的背景下，为了谋求中国南方广东护法政府支持韩国参加太平洋会议，并在太平洋会议上协调彼此立场以推动韩国独立，临时政府通过推动建立广州中韩协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南方护法政府与民间的交往。而围绕太平洋会议的召开以及寻求孙中山对韩国独立的支持，实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广东护法政府的外交承认，则是申奎植访问广东护法政府的重要外交使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抱着寻求广州护法政府支持韩国出席太平洋会议，以谋求韩国独立和实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广东护法政府的外交承认的双重目的，申圭植一行展开了其广州之行。

2. 申奎植的广州访问与申，孙会谈的日程考证

关于申圭植广州一行的日程与经过，据跟随申圭植访问广州的秘书闵弼镐所撰的《中韩外交史话》记载：申圭植根据临时政府国务会议1921年10月的决议，于10月26日清晨离开上海，28日下午抵达香港，29日访问了在香港蛰居的唐继尧，并与之进行会谈，承唐继尧修书惠介护法政府外交部总长伍廷芳。29日下午3点30分到达广州。次日早上会见胡汉民，徐谦(大理院院长)，吕志伊(内务部次长)，伍廷芳(外交部长)，伍朝枢(外交部次长)，谢持(总统府秘书长)，廖仲恺(财政部长)，林森(参议院院长)，郭泰祺(总统府宣传局长)，程潜(军政部次长)等护法政府要人。11月3日，胡汉民以申圭植一行系韩国临时政府特使为由，以国使规格安排与护法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会晤并举行会谈。11月10日，申圭植一行在广州图书馆出席了他来广州前就已筹备的广州“中韩互助社”成立大会¹³⁾11月18日，在广

年版，第40页。

州东较场北伐誓师典礼上,举行了申圭植向孙中山奉呈韩国临时政府国书仪式。从11月31日起,申圭植在位于中山县(现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的唐绍仪的公馆暂住数日,并与唐绍仪就即将举行的远东太平洋会议交换了意见。然后,申圭植一行又返回广州。12月2日,在广州新新餐厅设宴邀请驻在广州的美国、法国等国领事及总统府要人,以为韩国独立之宣传,并谋求美国和法国等的支持。12月25日,申圭植一行从广州出发,返回上海。

然而,上述《中韩外交史话》的记载,在日期和行程上似乎存在着以下若干问题:第一,回忆录中记载的申圭植一行与孙中山在大总统官邸会谈的日期11月3日以及韩国临时政府特使申圭植向广东护法政府奉呈国书仪式的11月18日,孙中山并不在广州。孙中山出席了10月13日召开的“非常国会”,并报告了北伐计划后,于15日即赴广西梧州督察北伐准备事宜¹⁴⁾,显然,此一时日,不可能实现申、孙会谈,也不可能举行国书奉呈仪式。第二,正如前述,广州中韩协会已于是年9月27日在广州图书馆成立,这与《中韩外交史话》中记载的10月10日,申圭植参加“中韩互助社”成立大会,在日期上也不一致。第三,不仅如此,根据上海《民国日报》的报道,申圭植一行于12月14日已在上海大东旅社设宴邀请60余名中国人士,对在参加太平洋会议,寻求韩国独立问题上,中国政府人士予以的协助表示感谢¹⁵⁾。而闵弼镐《中韩外交史话》的记载关于申圭植12月25日离开广州返抵上海的日期,显然与申圭植一行已于12月14日,在上海大东旅社设宴请客的事实不符。也即申圭植一行至少在12月14日前就已经返回上海。

最初提出上述疑问的是日本学者狭间植树¹⁶⁾,接着日本学者森悦子又对此进行了考证¹⁷⁾。韩国学者裴京汉也利用中、韩、日三方资料进行考证,

13) 闵弼镐写的是中韩互助社,而不是中韩协会,如前所述,从广州成立的中韩互助组织名称来看,应该是中韩协会。

14) 陈锡祺著《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8月版,第1386—1387页。

15) 《中韩人士之大宴会》,《民国日报》1921年12月15日,第3版第10张。

16) 参见狭间植树《孙文与韩国独立运动》,载《青丘季刊》第4集,1990年5月。

然而,对于申,孙会谈以及奉呈国书的日程,仍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作者认为:第一,1921年10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在《韩国代表谒孙总统,中韩协会不日成立》的小标题下附了短文,其主要内容是讲韩国人欲利用太平洋会议的机会,实现国家独立¹⁸⁾。不过,该报所载赴粤拜会孙中山的韩国临时政府代表是金檀庭,而非申圭植。但是,从该报报导韩国代表与护法政府孙中山商谈太平洋会议之事,可以判断与孙中山会谈者当为申奎植无疑。同年10月16日《四民报》有“韩国临时政府总理来广州,孙文以旧谊迎接,广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的电报新闻¹⁹⁾是为申奎植一行访问广州较可靠的记载。第二,韩国临时政府发行的《独立新闻》于11月11日报道:“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兼法务总长申圭植上个月上旬由于某种需要抵达广州,受到当地中方要人的热烈欢迎”²⁰⁾;“上个月上旬”即10月上旬。第三,据广东驻在日本总领事在报告中写道:“由不逞鲜人数十名组成之申圭植一行10月11日抵达广东,受外交部次长伍朝枢等人迎接”²¹⁾又据广州驻在高等警察在10月18日情报报告时,引用了《广东群报》题为《广东政府对韩使的态度》的报道,报告说:“韩国民党领袖申圭植以法务总长兼国务总理代理身份抵广东,受到新政府当局的接见。”²²⁾第四,根据“非常国会”议员丁象谦的回忆,“中华民国十年十一月,韩国临时政府特派该国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申圭植氏为专使,赴粤与中华民国政府接洽承认临时政府事宜。我孙大总统及国会非常会议所有参众两院议员极表赞同,即承认为统治韩国民族之正统的民主共和政府。”²³⁾上述史料对申,孙会

17) 森悦子《关于中国护法政府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正式承认问题》,载《史林》第76卷 第4号,1993年。

18) 《广州特约通信》,《民国日报》1921年10月 313,第1版 第3张。

19) (广州电),《四民报》1921年10月16日。

20) 《申圭植氏的动静》,《独立新闻》1921年11月11日,第3页。

21)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法务总长的广东访问汇报文件》,《朝鲜独立运动Ⅱ》 第168—169页;

22) 朝鲜治安状况(大正11年)》,《临政资料》,第897页。

谈的时间记载颇多歧异，作者认为根据中韩协会已于是年9月27日成立，而申圭植又出席了中韩协会成立仪式，那么，申圭植一行至少应该在1921年9月27日前抵达广州。据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先生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考证，孙，申会谈时间当为1921年10月3日²⁴⁾。笔者2005年在韩国访问研究时与金俊烨先生谈及此事，金先生也认为回忆录时间有误。据金俊烨先生夫人闵泳珠女士接受辛胜夏教授采访时回忆，应为1921年10月3日²⁵⁾。所以，可以确定韩国特使申圭植一行10月3日与孙中山在总统官邸举行了双方会谈，并就广东护法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外交互相承认达成了一致。

此外，关于国书呈递仪式问题，根据《民国日报》1921年10月8日有关“粤军北伐之积极进行，各部军队陆续出发”的报道，其谓：“许崇智所部五旅三团，共二万人；李明扬，赖世璜赣军五千人，邓铿一军所部选出最精锐之兵一混成旅，数日内由省出发，李福林兵伍千，已预备完全，随孙总统出发。”²⁶⁾如果说举行了北伐典礼，应该说正是10月8日前的某一天，根据新闻报道的时效性推测，应为10月7日。根据《中韩外交史话》的记载，在东校场北伐出师典礼上安排了孙中山正式接见韩国特使申圭植的仪式，然而，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孙中山并非是在北伐出师典礼上接受申圭植呈递国书，而是在东校场参众两院议堂专门安排了接受申圭植呈递国书的仪式，“十一月十八日，孙大总统率领参众两院议员及各部部长与陆海军将官，在东校场两院议堂正式接受申专使奉呈之韩国国书，待以国使礼。”²⁷⁾参加该仪式的主要有时任参议院议长的林森，中国国民党总办事

23) 丁象谦《忆韩国临时政府深得我孙大总统及国会非常会议同情之经过》，载《韩民》第1期 第2号，1940年4月25日。

24) 参见陈锡祺著《孙中山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 1991年8月 版，第1382—1383页。

25) 参见石源华 金俊烨主编《申圭植闵弼镐和韩中关系》首尔，나남출판 2003年4月 韩文版，第771页。

26) 《民国日报》1921年10月8日。

处主任张继,广州市长孙科,总统府宣传局长郭泰祺,军政部长元占会与许崇智,程潜等。²⁸⁾由于“十一月十八日”孙中山已不在广州,因此,举行国书奉呈仪式的日期,应该是在孙中山赴广西梧州的10月15日之前。如果根据《民国日报》关于北伐出师的记载推测,应该是在10月7日。

因此,我们认为韩国临时政府特使申圭植是在1921年9月27日前到达广州的。10月3日申圭植一行与孙中山会晤并进行会谈。10月7日,在广州东校场参众两院议堂专门安排了接受申圭植呈递国书的仪式,《中韩外交史话》认为在北伐出师典礼上举行了韩国临时政府特使向孙中山护法政府奉呈国书的仪式是不正确的。申圭植一行在广州逗留了两个月,其间并于10月底赴珠海唐家湾会见唐绍仪,并在唐家湾暂住数日。11月底或12月初,始离开广州返回上海。

根据前述,1921年10月3日,申圭植与其随行秘书闵弼镐到达广州观音山(现称越秀山)非常大总统官邸,与时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根据《中韩外交史话》的记载,其会谈的主要内容是申圭植向孙中山提交了事先准备好的《互惠条约》5款:“(1)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承认护法政府为大中华民国正统政府,并尊重其元首与国权。(2)请大中华民国护法政府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3)请准予收容韩国学生于中华民国军校。(4)请借款500万元。(5)请准予租借地带,以资养成韩国独立军。”对此,孙中山以北伐尚未成功,国家尚未统一,第四,第五条至少在北伐占领武汉后方可以做到。而对于第二条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原则上”毫无问题。第三条关于收容韩国子弟于军校,养成韩国军事人才,孙中山当即表示“通令各军校,盡量收容”而借地练军一款,孙中山认为北方最事宜,然当时护法政府的力量尚不能到达华北。此外,双方还商定外交使节

27) 马义《韩国临时政府史略》,载(韩)《韩国独立运动史资料集》(中国篇)103—107页。

28) 参见马义《韩国临时政府史略》,载(韩)《韩国独立运动史资料集》(中国篇)103—107页。

的派遣制度,韩国临时政府驻广州使节膳宿费用全由广东护法政府承担。可见,孙、申会谈,最大的成果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得到孙中山广东护法政府的外交承认,这是韩国临时政府在国际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得到的外交承认。²⁹⁾

3. 广东护法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外交承认的法理性问题

根据《国际法》的一般规定而言,一个国家或政府若承认另一个国家或政府,一般要表示确认其领土,人民和主权等国家或政府的成立要素,并缔结外交关系。承认的形式有宣言,外交条约以及虽未能履行条约批准程序而先予以事实承认等。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一旦取得外交承认,那么,它便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具有国家主权政府的性质。因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1919年4月在上海成立之日起,就一直为谋求国际社会的外交承认而不懈努力。在临时政府制定的对华外交政策中,谋求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外交承认,是临时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申圭植访问孙中山广东护法政府时,向孙中山提出的五项请求,其中第一款即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广东护法政府的外交承认问题。尤其是当时“南北议和”活动正在进行,或有中国南,北方政权共同组织代表团参加太平洋会议之传闻,后来由于广东护法政府的拒绝而不果。因此,韩国临时政府对于广东护法政府协助其参加太平洋会议,并在太平洋会议上寻求中国和列强协助韩国独立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虽然,当时韩国临时政府并不清楚广东护法政府不可能与北洋军阀政府共组代表团参加太平洋会议,但从广东护法政府处取得外交承认,也具有在国际上被承认为主权政府的法理效力。

韩国学者裴京汉认为,广东护法政府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仅仅停留在事实承认的阶段,申圭植访问广东护法政府会见孙中山时,提

29) 以上内容参见闵石麟编著《中韩外交史话》,重庆,东方出版公司,1942年。

出韩国临时政府与广东护法政府互相承认的议案，虽然经过国务会议决议，但并未经过韩国临时议议院审议，而广东护法政府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也没有经过“非常国会”的讨论决议，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并认为韩国临时政府缺少作为完整国家形态的“领土”要件，是影响广东护法政府进行法理承认的主要因素。³⁰⁾然而，笔者并不以为然。首先，根据《国际法》关于外交承认的一般规定。两国间的外交承认，一般是通过谈判，签订条约或者发表共同声明等方式确立，外交承认的主要表现是两国互派常驻外交使节。至于代议机构如国会，议议院等的决议，并非外交承认的必要条件。如前所述，在1921年10月的申，孙会谈中，申圭植还请求与护法政府建立持久性外交联络机制，即建立外交使节派遣制度，孙中山当即表示同意，并允许临时政府代表常驻广州。显然，广东护法政府不仅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也与韩国临时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其次，在1921年11月下旬召开的广东护法政府“非常国会”上，审议并讨论通过了广东护法政府承认大韩民国独立的议案，“广州非常国会，决议承认韩国独立，致电中国代表，授意代表，主张韩国独立”³¹⁾从法理上说，不论当时是否通过“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案”，只要审议通过承认韩国独立的议案，也就必然为护法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事实承认赋予了法理效力。根据前述丁象谦的回忆，1921年11底召开的“非常国会”，由于事涉机密，曾非公开地正式审议并通过了承认大韩民国独立的提案³²⁾。而审议通过承认韩国独立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非常国会”对韩国临时政府进行的外交承认的法理化过程。因此，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前夕，韩国临时政府再一次要求从中华民国政府取得正式承认时，即据此认为1921年孙中山护法政府已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³³⁾。

30) 参见韩国裴京汉《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31) 赵珣九《韩国临时政府奋斗史》，载《韩民》第1卷第5期，1941年6月15日。

32) 《国会中朝鲜独立提案》，《民国日报》1921年12月5日。

33) 《中韩文协：昨举行座谈会讨论承认韩政府问题》，《大公报》(重庆) 1944年9

此外，广东护法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在事实上的外交承认是否具有法理性，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一般认为要取得合法的承认，首先应具备人民、领土及永久性的主权政府。但是对于反抗外国殖民统治和侵略的流亡政府，其合法性主要是根据其能否代表被殖民统治的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尽管当时的韩国临时政府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是临时政府成立于上海的法租界内，行使统治力的领土也无法保障。但是，韩国临时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均是发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三·一运动”的领导人，而且，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作为现今大民国政府“法统”的渊源，理应是代表韩民族利益的主权政府。正因为如此，所以，广东护法政府鉴于韩国被日本吞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已作为代表韩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流亡政府，并在中国进行独立活动的事实，还是作出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决定，并在国会通过了承认韩国独立的议案。因此，领土问题并未成为广东护法政府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在外交上的障碍。尤其是在1921年11月末由“非常国会”所通过的韩国独立提案中，明确表示广东护法政府将以提出议案的形式向太平洋会议转达这一提案。其主要内容是“日本吞并韩国的行径，始于其违背《天津条约》与《马关条约》之时，中国无力阻止这一事实，实乃耻辱之事。近年吾国在野名流与韩国志士发起中韩诸协会。今者太平洋会议已开幕，专为解决远东问题，何若乘此时机，将此案由大会议决，韩国本为独立国，被日本无理侵占，通电全国，并径电达太平洋会议，一洗我国外交隐忍之耻。”³⁴⁾由此可见，“非常国会”根据申圭植一行的要求和护法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在国会中一致讨论并通过韩国独立提案之目的，是要为即将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推动韩国问题的解决，实现承认韩国独立的目标。而如前所述，申圭植广州之行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取得广东护法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外交承认的基础上，谋求护法政府在太平洋会议上，对韩国独立以支持。从申圭植访

月23日。

34) 《国会中朝鲜独立提案》，《民国日报》，1921年12月5日。

问广东护法政府的结果来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仅与孙中山广东护法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广东“非常国会”还审议通过了韩国独立的议案，并通过向太平洋会议转达这一议案的方式，以全力支持韩国独立。

综上所述，韩国临时政府代总理兼法务总长申圭植一行对广东护法政府的访问，并通过与孙中山的会谈，双方不仅实现了外交上的相互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广东护法政府“非常国会”还审议通过了韩国独立的议案，并向太平洋会议转达对韩国独立的支持，这是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重大政治外交事件。尽管目前尚无确凿史料证明“非常国会”通过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提案，但是，“非常国会”审议通过韩国独立提案的过程，其本身即是对广东护法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立事实外交承认的法理化过程。因此，“非常国会”承认韩国独立案，也就意味着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而也就赋予了孙中山护法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外交承认的法理性。虽然，广东护法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承认，在当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下，可能缺乏严格的国会批准的程序，但是，韩国临时政府作为代表韩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流亡政府，我们不应该以现今一般的国际法规范中有关“领土”的规定，否认广东护法政府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承认的法理性。

二.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中山大学与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人才培养基地和独立运动的活动中心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立中山大学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国立中山大学，原名国立广东大学，与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孙文(中山)先生于1924年亲自创立，国立中山大学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堪称文武双璧，是近代国民革命人才培养的摇篮，不仅为中国近代革命培养了大批文治武功的人才，同时，也

成为二三十年代韩国独立运动在广东的人才养成基地和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策源地。

1. 国立中山大学的韩籍入学生

早在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初期,即有部分韩国革命青年进入广东大学留学。自1926年8月开始,为了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国立广东大学创始人孙文先生,经国民政府决议,将国立广东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自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以下称中山大学)创立到1927年5月大革命失败前,国立中山大学共招收了57名韩国留学生³⁵⁾,其名单具载于广东省档案馆所藏《国立中山大学同姓学生名册³⁶⁾》,崔凤春先生也曾列表加以收录³⁷⁾。在名册中,理学院李英俊和文学院刘禹相为三年级生,应为1924年中山大学创立时入学,1925年入学者8人;1926年入学者38人,1927年入学者4人,包括预科班。其中李英俊,张志乐,金星淑,郑求麟等均是韩国革命团体义烈团的成员。所谓义烈团,是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的革命团体,其最初在中国东北和上海一带从事反日活动。在中山大学他们主要学习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学,还有留学生学习理学,工科和农业以及医学等。1926年大革命高潮时期,来到广州的韩国革命青年有数百名之多,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关内地区和东北,韩国本土以及苏联,日本等地来到广州留学并参加中国大革命的有名的青年志士³⁸⁾。所以,从上述广东档案馆所藏名单来看,1926年入学中山大学的韩国青年在二十年代达到高潮。然而,

35) (韩国)庆尚北道警察部编《高等警察要史》(1934年),여강출판사,1986年韩文版。

36) 广东省档案馆藏《1926,1927年度国立中山大学同姓学生名册》,全宗20(1)。

37) 参见崔凤春《中山大学与1920年代朝鲜人的革命运动》,韩国《史学研究》第48册,1994年。

38) 参见崔凤春《中山大学与1920年代朝鲜人的革命运动》,韩国《史学研究》第48册,1994年。

从有关名单也可以看出1927年5月以后，韩国青年学生入学中山大学者以及在学生员明显减少，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1927年4月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实行“清党反共”政策，导致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义烈团团长金元凤和黄埔军校韩国教官孙斗焕也先后离开广州，大革命失败，这对于来到广东，寻求独立革命道路韩国青年学生以重大打击。1927年12月，在广州黄埔军校以及中山大学就读的二百余名韩国革命青年，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留学生也纷纷离开广东，前往上海和武汉等地。因此，二十年代，虽然有数十名韩国青年入学中山大学留学，但是，最后完成学业并顺利毕业的韩国青年只有两名，一是法学院的金星淑；另一位是医学院的金圭善³⁹⁾。因此，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来中山大学留学的韩国留学生大幅度减少，其独立活动也陷入低潮。

到了三十年代初，由于“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占领了东北和上海一带，在东北和上海等地进行反日活动的韩国青年又逐渐涌入广州。从1932年开始，原在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就读的韩国留学生李贞浩转学到中山大学文学院，其转学的原因，是由于其在厦门大学经济困难，而中山大学对韩籍学生“学费减额与优待”，且中大“为革命策源地，恪遵总理遗志，对诸弱小民族莫不力为扶助”⁴⁰⁾中大遂允其所请，将其转入文学院英文系就读。1932年，上海发生尹奉吉虹口爆炸案，日军大肆搜捕韩国爱国青年，故上海的韩国学生纷纷转移到广州就读，其中韩国独立党华南支部长金起元的子女金孝淑，金贞淑和金德穆均入读于中山大学。1933年春，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的具益均来到中山大学担任法学院助教，大力推荐韩国青年入读中山大学，并为他们提供入学的便利。故1933-1935年两年期间，广州以及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逐渐增加到五十名。⁴¹⁾然而，1935年初，具益均却不得不离开中大，其原因是对中

39)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历届韩籍毕业生调查表》，存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0(2)。

40) 李贞浩《上国立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书》，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0(2)。

41) 具益均《具益均回忆录》*떠난날* 1994年10月韩文版，第142页。

山大学韩藉学生申永石的间谍冤案负有责任⁴²⁾。1934年,毕业于文学院英文系的李贞浩留校担任助教,主要负责韩国留学生的入学,管理以及指导等事宜。李贞浩为韩国民族革命党学生指导员,其担任助教后,大力推荐韩国民族革命党党员入读中山大学。据其1937年8月上校长邹鲁的呈文,称“呈请准与优待录取本年度新入志愿韩藉生金灿奎等十五名中之七名。”⁴³⁾据中山大学二十六年度(1937年)新入志愿韩藉生名单,其推荐的七人为郑元衡,金龟泳,朴次贞,金灿奎,文靖珍,金景云,李英俊,大多数是朝鲜民族革命党党员。⁴⁴⁾又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扩大侵华战争,入读中山大学的韩国学生也大幅度增加到80名,其部分学费由旅粤韩人光复会提供。⁴⁵⁾此外,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还商定了中山大学和广东军官学校为韩国独立运动培养200名韩国革命青年的计划。⁴⁶⁾根据韩国崔起荣先生研究统计,1937年以前,在读中山大学的韩藉学生有55名,其中文学院20名;法学院19名;理学院1名;工学院2名;农学院2名;医学院4名;美学7名。⁴⁷⁾现据《国立中山大学历届韩藉毕业生调查表》统计,三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有九名,文学院两名,其余均为法学院学生。其名单是文学院李贞浩(英文系),金昌华(教育系),法学院徐尚虎(法律系),安炳武(政治系),金贞淑(经济系),金孝淑(经济系),宋冕秀(经济系),金德穆(经济系),金腴(经济系)⁴⁸⁾因此,三十年代中期,中山大学已成为与韩国独立运动密切相关的教育机关,并与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以及旅粤韩人光复会等韩国革命团体建立了密

42) 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全宗20(3)。

43) 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山大学档案,全宗20(2)。

44) 同上。

45) 杨昭全,前揭书,第74页。

46) 具益均,前揭书,第141-142页。

47) 参见崔起荣《1930年代中山大学和韩国独立运动》(韩文),韩国《震檀学报》第99号别册,2005年6月,第85-87页。

48) 《国立中山大学历届韩藉毕业生调查表》,存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0(2)

切的关系，成为中国南部开展韩国独立运动的策源地。⁴⁹⁾

1937年7月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山大学就读的韩国青年纷纷离开学校，加入中国对日抗战的行列。从是年12月开始，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来到南京，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举办的陆军中央军官学校星子分校接受军事教育。1938年10月，他们又参加了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队，也有留学生如金昌华去了桂林，参加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参加朝鲜义勇队的中山大学韩国留学生人数达到20名，占三十年代中山大学韩国留学生的三分之一⁵⁰⁾。四十年代初，根据中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和要求，朝鲜义勇队改称韩国光复军，而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李贞浩，崔章学，文靖珍均为第一支队的成员。因此，1938年至1945年8月韩国光复期间，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已大多离开，所以，四十年代毕业的韩国留学生只有金龟泳一名⁵¹⁾，还是因为在前线战场上负伤，由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金若山亲自推荐，继续返回中山大学法学院就读⁵²⁾，于1942年6月在法学院经济系毕业。

2. 国立中山大学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

自二十年代国立中山大学创立到四十年代中期韩国光复前后，国立中山大学共为韩国培养了二百余名革命人才，成为韩国独立运动时期人才培养的基地。根据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邹鲁回忆，中山先生曾经指令国立广东大学大量接受韩国流亡青年，并享受公费生待遇，为韩国独立革命培

49) 参见《韩民族独立运动史资料集》46，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2001年版，第151页。

50) 参见崔起荣《1930年代中山大学和韩国独立运动》(韩文)，韩国《震檀学报》第99号别册，2005年6月，第100页。

51) 《国立中山大学历届韩籍毕业生调查表》，存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0(2)

52) 《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金若山致中山大学萧代校长函》，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0(2)。

养人才。其谓：“民国12年(1923年)，我接受国父(指中山先生)的指令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大量接受安南，台湾以及韩国青年入学。不仅提供入学考试的便利，而且给与免费待遇，同时，还供给衣服，书藉，韩国青年入学者最多，以培养韩国复国的人才为目标。”⁵³⁾ 由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积极支持韩国独立运动，不仅使韩国独立运动在广东得到迅速发展，甚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度考虑将上海临时政府迁入广州⁵⁴⁾，而且，也为大批韩国青年入学国立中山大学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和入学条件。中山大学秉承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同情和支持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对于大批失去国家，又无经济来源的韩国留学生多方予以收留，并给与免学费和提供生活费等待遇，因此，大批韩国留学生来到广州从事独立运动，与中山大学对韩国留学生的优待政策，具有密切的关系。中山大学对韩国留学生的政策和对独立运动的支持，主要是：

第一，减免学费，并提供奖学金和生活费优待，积极为韩国独立运动培养人才。如前述李贞浩由厦门大学转入中山大学，即因为中山大学优待韩国学生。李贞浩担任助教后，也负责韩国学生的学费减免事宜，据中山大学韩国留学生刊物《勇进》所载，“朝鲜学生品行优秀者，学，宿等费用全免，详情请向中山大学李贞浩先生查问”⁵⁵⁾。经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保荐，刺杀日本伊藤博文的志士安重根之侄子安禹生入读中大，不仅学费，住宿费全免，而且学校还提供生活费。又，韩国民族革命党华南支部书记金瑞南致函校长邹鲁云：“贵校优待鄙国学生，预留名额，盡力收容，造成人才。”⁵⁶⁾ 为培养韩国独立运动人才，中山大学也积极与韩国独立运动团

53) 参见邹鲁《祝朝鲜复国的回顾》，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0月25日。

54) 《日本高等警察报》第28417号，第28567号《国外情报》，参见金正明编《朝鲜独立运动》(二)东京，原书房，1967年版，第474页。

55) 《勇进》第一期，《国立中山大学简况》，转引自 崔起荣《1930年代中山大学和韩国独立运动》(韩文)，韩国《震檀学报》第99号别册，2005年6月，第81页。

56) 《韩国民族革命党华南支部书记金瑞南，学生指导员李贞浩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函》，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0(2)。

体联系配合, 其为韩国独立党培养人才建立了特殊的秘密管道, 即使是韩国光复后, 留学中山大学的韩藉学生仍以公费生待遇全免学杂费。⁵⁷⁾ 对于因战乱毕业证书遗失或报考资料不全之韩国学生, 中山大学也破格变通加以办理入学手续。如法学院四年级生金德穆因上海事变, 各种肄业证书遗失, 校长邹鲁亲自批示: “请念韩生千里来学苦心, 曲予通融, 准许注册, 并转呈教育部宽予承认入学资格。”又附批云: “准予注册并即查明韩藉生类此情形者, 具报以凭核办。”⁵⁸⁾

第二, 中山大学积极营救因参加抗日示威等政治活动而被捕的韩国留学生。1936年1月13日, 为了支持北京大学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运动, 中山大学爆发了四千名学生参加的反日示威运动, 韩国留学生积极组织参加, 次日, 广东省会公安局逮捕了积极领导组织反日示威的韩国留学生金昌华, 金孝淑, 郑求麟, 李苏民和部分中国学生, 经邹鲁校长保释, 金昌华, 金孝淑和 郑求麟 均获得释放, 但是, 韩国学生李苏民和部分中国学生仍被扣押。于是 金昌华等韩国留学生联合中国学生共350名向校长邹鲁提出请愿书, 要求学校与公安局交涉释放被捕学生。在校方的交涉下, 广州公安局终于释放了被捕的韩国留学生李苏民和大部分中国学生。此外, 即使是已经毕业的韩国留学生被警方拘捕, 中山大学仍出面加以保释。1937年9月, 从中山大学教育系毕业的金昌华在广州东山旅馆与北方来的韩国志士会商抗日爱国工作, 不意被广州公安局误为日本间谍拘捕, 中大文学院二十余名中国学生联名上书院长吴康, 以忠实人格甚至生命担保金昌华君“品学兼优, 且对我国抗敌救亡工作, 无不赤诚热烈赞助, 绝无汉奸间谍行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上校长邹鲁书》, 广东省档案馆, 全宗20(2)。⁵⁹⁾ 要求文学院和学校与公安局交涉, 终于使金昌华和其他误为汉奸间谍的韩国志士获得释放。

57) 《中国教育部致中山大学电》1946年10月18日。广东省档案馆, 全宗20(2)。

58) 《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批件转注册部萧主任》, 广东省档案馆, 全宗20(2)。

59) 《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批件转注册部萧主任》, 广东省档案馆, 全宗20(2)。

第三，中山大学对于韩国留学生创办的宣传韩国独立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杂志，积极加以支持和爱护。由于韩国留学生政治身份和背景不同，政治信仰也不同，有的信仰民族主义，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此，在如何实现韩国独立的问题上，留学生内部也经常发生论争。在他们创办的杂志《勇进》上经常有不同观点的交锋。邹鲁校长一方面担任“勇进学会”的顾问，并为《勇进》杂志题名，积极支持韩国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是对于有的韩国学生在《勇进》杂志撰文鼓吹“共产主义”，主张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革命，邹鲁校长不仅没有压制学生的讨论，而是自己也在《勇进》杂志撰文，以“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吗？”⁶⁰⁾，与韩国学生平等探讨社会问题。由于校方的支持和爱护，韩国留学生创办的《勇进》杂志成为中山大学宣传民族革命和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舆论工具。

三. 广州时期黄埔军校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

1. 广州时期黄埔军校的韩籍入学生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另一中心就是黄埔军校，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长州岛，故名。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为养成中国革命政治军事人才亲自创立，1926年6月，依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改称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辖政治、教授、管理、军需、军医五部，后增设教育长和军法处，参谋处。黄埔军校还先后在潮州，武汉，长沙，南昌和洛阳设有分校。迄1930年9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时

60) 转引自 崔起荣《1930年代中山大学和韩国独立运动》(韩文)，韩国《震檀学报》第99号别册，2005年6月，第93页。

为止,黄埔军校在广东期间,共招收了1—7期学员,其中除第二期外,第一,三,四,五,六,七期均有韩国籍学员。台湾胡春惠教授根据《黄埔军校史稿》《黄埔军校史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7月版。⁶¹⁾的所载毕业生籍贯统计表统计认为黄埔军校在广东期间韩籍学生有第三期四人,第四期二十四人,第五期六人,共计三十四人。⁶²⁾然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即开始有韩籍学生。据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1926年6月16日举行黄埔军校两周年纪念式演讲词中明确提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四百七十名中,只有一名韩国人。⁶³⁾据台湾学者叶泉宏考证,其为第一期步科第四队李秉聪。⁶⁴⁾只是因史料缺载,该韩籍学生事迹难以详考。此外,黄埔军校在广州共兴办七期,其中第六期韩籍学生9名,第七期韩籍学生一名李石。⁶⁵⁾因此,黄埔军校从1924年1月在广州创立到1930年9月停办,黄埔军校在广东期间,共为韩国培养政治军事人才,共计四十五人。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时期,为养成韩国独立革命军事人才,由临时政府的赵素昂,朴赞翊等通过中国上海国民党政府陈果夫的推荐,招募大量韩国流亡学生入读广东黄埔军校。1924年1月,由于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长期奉行恐怖暗杀活动的义烈团团团长金元凤认为有必要改变此种斗争模式,应该团结在中各种韩人团体,组织韩国自己的革命武装。因此,1924年春,金元凤来到广州亲自拜会孙文,请求让韩籍学生大量入读黄埔

61) 转引自 崔起荣《1930年代中山大学和韩国独立运动》(韩文),韩国《震檀学报》第99号别册,2005年6月,第93页。

62) 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年3月版,第73—74页。

63) 参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11月版,第676页。

64) 叶泉宏《黄埔军校韩籍学生考实》,在《韩国学报》(第14期),台北,中华民国韩国研究学会编,1996年5月。

65) 韩相涛《中国革命中的韩国独立运动》,(韩文版)首尔,集文堂,2004年2月版,第93页。

军校,以为韩国独立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得到孙文的积极赞同。金元凤也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金元凤的推荐下,大批韩国青年尤其是义烈团成员进入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主要学习军事课程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1926年春,在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室副官兼教官,也是二十年代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人物孙斗焕的介绍下,金元凤又同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金星淑一起拜访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并就韩籍学生免学费等问题,取得了蒋介石校长的同意。入读黄埔军校的韩人除金元凤系统的义烈团以外,还有参加东北和俄领地区的统义府和朝鲜革命军的韩国青年。此外,作为二十年代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团体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也大量介绍流亡的韩籍学生入学。因此,到1927年末,黄埔军校各级军事机关,包括教官,教导团以及学生军等均存在大量的韩籍学生。1927年12月,参加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的黄埔军校学生,即是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教导团为主力而展开的。由于为了躲避日军情报机构的侦查,入读黄埔军校的韩籍学生多以中国籍贯注册,尤其是以东北地区吉林省,辽宁省和黑龙江省为主,姓名也经常变换。⁶⁶⁾

2. 黄埔军校韩籍入学生的独立运动

黄埔军校的韩籍学生大部分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活动和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其中第三期生的李彬还担任了第四期政治科学生大队的支队长,并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中担任炮兵指挥官。李逸泰担任第五期学生支队长不仅参加北伐,而且还积极从事韩国独立运动。第四期的金元凤毕业后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并推动韩人建立民族协同战线运动。朴孝三,姜平国,担任了沙河兵营入伍生部教官。权^ㄱ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炮兵营副营长兼武汉分校训练部教官,并成为留鄂韩国革命青年

66) 参见韩相祷《中国革命中的韩国独立运动》,(韩文版)首尔,集文堂,2004年2月版,第92—93页。

会秘书和武汉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心人物。此外，第四期韩籍学生还有金钟，李集中，杨林，卢一龙，朴建雄，李愚亮，吴世振，劳世芳均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从事韩人独立运动，其后来都成长为义烈团，朝鲜民族革命党和朝鲜义勇队的骨干。第五期韩籍学生主要是朴始昌，申岳，安维才，张翼，金浩元和张兴共六人。其中朴始昌参加了中国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的创立，1943年以后成为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申岳也成为后来朝鲜民族革命党和朝鲜义勇队以及光复军的军官，从事韩国独立运动。张兴在中国宪兵机关任职，并担任韩国独立运动家的通讯联络工作。第六期学生李春岩在中国军情报机关工作，并积极参加义烈团和朝鲜民族革命党的活动。此外，宋旭东在武汉分校政治科毕业，也作为黄埔第六期生，后来进入中国陆军大学第八期。就读中国陆军大学的韩国人还有崔沧石，毕业于保定航校特五期，王逸曙，毕业于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四十年代韩国光复前，曾经担任广东省政府处长，其子王奋民为广东省保安司令部服役。1945年8月韩国光复时，王逸曙随美军返回韩国，其子经广东省政府推荐，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⁶⁷⁾但宋旭东是黄埔籍唯一一位就读陆军大学的韩国学生。

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的杨林，崔秋海和武汉分校的毕业生陈公木，金致廷等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朝鲜共产党，杨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优秀军事指挥官，在东渡黄河，北上抗日的军事行动中牺牲。此外，第四期生李箕焕和武汉分校的毕业生庄海平联合中国人一起根据自由联合和相互扶助的精神建设理想村，以探寻抗日的道路。

综上所述，二十年代成立的黄埔军校和国立中山大学成立，是中国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摇篮和发源地，黄埔军校和国立中山大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从事韩国独立运动的革命家，而且，广东地区的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近代民主大革命互相结合，在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入读的韩国籍学

67)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驻华南办事处公函》驻南字第27号，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3)。

生，他们将中国近代民主大革命看成是寻求韩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因而韩国籍学生所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参与，构成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特征。

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主要独立运动政党、团体在广东的活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广东，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民主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由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十分同情和支持东方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革命，因而吸引了东方殖民地国家和民族一大批的革命志士来广东积极开展民族独立运动，广东地区也成为东方被压迫民族进行独立运动的基地。

1921年9月25日，韩国独立志士朴泰和在广州成立了“旅粤韩人同乡会”，以同乡互助的名义，开展独立活动，这是在广州成立的较早的韩人团体；同年，受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派遣，金擅庭和金熙綽以及朴化祐等独立人士来到广州，积极与中国广东护法政府以及国会，舆论界等人士联系筹组“中韩协会”事宜，并于是年9月27日，在广州图书馆正式召开“中韩协会”成立大会。参与成立组织“中韩协会”的中方人士主要有汪精卫，丁象谦，谢英伯，朱念祖，高振霄，张启荣，叶夏声等，均为军政府和国会的重要人士，其中谢英伯不仅是非常国会议员，而且还担任《广州日报》社长，为“中韩协会”创办《光明》杂志，作为宣传韩国独立运动的工具，为韩国独立进行舆论宣传。

1. 广州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的成立与活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广东地区成立的独立运动团体主要是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和勇进学会。其中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主要是由黄埔军校

和国立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所创立。1926年由黄埔军校韩国籍教官孙斗焕以及义烈团团长,黄埔军校学员金元凤,吴成嵩,金山与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金星淑等在广州创立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其成员以义烈团的主要人物为主,会员达三百余名,为广东地区1926-1927年最有力的韩人独立运动团体。其主要活动:一是该团体承担韩国流亡青年入学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的担保工作,其中金东轼,金鎮东,金东秋,金正石,安偶生,徐义骏,金凤洙等韩国独立运动的骨干均是由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担保入读中山大学;第二是由金星淑负责创办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团体机关刊物《革命运动》对韩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民族问题以及革命指导权问题等进行宣传,其主张韩国革命家为了民族解放,应该自觉参加中国大革命,以打倒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⁶⁸⁾第三,1927年4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临时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山大学韩国留学生马骏,郑有麟,徐义骏,李英俊,蔡元凯,李活,金东州,金山和金元植当选为执行委员。1927年5月,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以金星淑为中心改组为大独立党组织广东促成会。是年11月,郑有麟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韩国独立党关内促成会联合会,以后又改为中国本部韩人青年同盟⁶⁹⁾。此外,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的学生还参加了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1926年夏开始,北伐军从广东出征,进行北伐,加入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的黄埔军校韩国留学生也编入学生军参加北伐。国共合作破裂以后,1927年12月,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信仰共产主义的韩国留学生二百余名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暴动,主要负责人是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的金星淑。根据其夫人中国人杜君慧的回忆:“金星淑是广州暴动主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第二营第五连的中国共产党负责人

68) 参见韩相涛《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军官学校》(韩文版)首尔,퍼낸날,1994年3月版,第145,158,159,166,183,185页。

69) 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保安课《朝鲜的治安状况:昭和二年版》,青丘文库,1984年。

。70) 暴动失败后,有150余名韩国留学生为中国革命而壮烈牺牲,他们大都是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的会员。

2. 朝鲜民族革命党,韩国独立党和韩国国民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独立运动各主要政党也积极在广东地区开展独立运动。朝鲜民族革命党和韩国独立党以及韩国国民党,先后在广东组织华南支部或广东支部进行组织活动。⁷¹⁾ 韩国国民党派遣理事金起元担任驻粤代表,负责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指导和组织工作。

(1) 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首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以金元凤,孙斗焕等为代表的义烈团在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的活动,尤其是以义烈团员为主体的留粤韩国革命青年会吸引了大批韩国流亡青年来到广东入读黄埔军校与中山大学,为后来建立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准备了大批骨干人才,因此,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广东进行独立运动的势力非常牢固,而且活动也很活跃。1932年11月,原韩国独立党,义烈团,新韩独立党,朝鲜革命党以及美洲大韩人独立党在南京合并,共同组成统一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由原义烈团团团长金若山担任总书记,为韩国独立运动时期最主要的两大政党之一。在广东地区担任朝鲜民族革命党华南支部的书记长是金瑞南,中山大学韩国学生指导员是李贞浩。朝鲜民族革命党华南支部书记长金瑞南曾致函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宣称朝鲜民族革命党是广东地区唯一的韩人独立运动团体,要求中山大学优待接受韩国留学生必须以朝鲜民族革命党为唯一交涉对象。

70) 《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1980年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第255-258页。

71) 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广东的组织名称是“朝鲜民族革命党华南支部”,书记是金瑞南;韩国独立党在广东的组织名称是“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负责人是金起元。

其称：“贵校优待鄙国学生，预留名额，盡力收容，造成人才，感激之余，不胜欣慰。惟自昨年七月以来，鄙国各革命团体观内外情势所迫切，及宜统一，故以‘民族革命党’名义统一。而前者‘韩国独立党’及其它小团体业经解体。此后关于介绍韩生入学于贵校一事，亦用以本党名义，概负责任。”⁷²⁾

1935年9月，朝鲜民族革命党派遣姜昌济担任华南支部和广东区的负责人，李景山和宋冕秀担任了民族革命党华南支部的中央执行委员，他们全部是中山大学原韩国独立党的重要人物。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在历史上大部分是朝鲜民族革命党的党员，因此，朝鲜民族革命党成立后，中山大学的助教李贞浩以及李斗山，金昌华，李景山，韩泰宙，安炳武等大部分韩国留学生均成为朝鲜民族革命党成员。民族革命党华南支部的主要活动如下：

第一是形势分析与独立运动的组织建设。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6月，在中山大学文学院或教职员宿舍进行每月两次或者多达四次的聚会，讨论党务报告和形势报告。1936年6月，他们在中山大学医学院举行了执行委员的改选。1937年1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广东华南支部有25名党员。

第二是组织抗日游行示威活动。1936年1月13日，为了支持北京大学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运动，中山大学爆发了四千名学生参加的反日游行示威运动，青年学生捣毁广东省教育厅机关，并发生枪击事件等过激行为。据广东省会公安局查证，此次游行示威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者即是朝鲜民族革命党在中大的骨干韩国留学生金昌华，金孝淑，郑求麟，李苏民等和部分中国进步学生。尤其是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金起元的女儿金孝淑，不仅参加朝鲜民族革命党，而且还窃取其父亲左轮手枪，因而被其父亲指责为“思想有不健全倾向”，要求广东省公安局将其女儿拘留送感化院教育，并追缴回被窃去的手枪。⁷³⁾

72) 《韩国民族革命党华南支部书记金瑞南， 学生指导员李贞浩致中山大学校长函》，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第三，朝鲜民族革命党华南支部在广东地区积极组织独立运动团体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其组织的独立运动团体主要就是中山大学韩国留学生创立的勇进学会，并发行《勇进》杂志，宣传韩国民族独立运动。1933年3月，李贞浩，金孝淑，金昌华等发起成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勇进学会。勇进学会的目标是为了民族的自主振兴，谋求智，德，体的养成和促进留学生的和睦感情。会员为中山大学及其附属学校的韩国籍在学青年，学会委员长是金明星。各执行部主任分别是社交部金明星；财务部金昌华；学部宋冕秀；运动部李贞浩；庶务部郑求麟。顾问是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教务长萧冠英，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金起元，还有法学院助教具益均。勇进学会的对外名称是广州韩国留学生会，一方面谋求民族的自主振兴和智，德，体的养成以及促进留学生的和睦感情；另一方面也以宣扬韩国独立与反满抗日为目标。⁷⁴⁾

(2) 韩国独立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其次，由韩国临时政府金九派韩国独立党的指示，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在1932年成立。其名称是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负责人是金起元。然而，据《独立有功者证言资料集Ⅱ》金贞淑的回忆，在广东的韩国独立党名称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粤代表团，⁷⁵⁾然而，据笔者查阅广东省档案馆收藏有关文献，并未发现有这样的名称，韩国独立党与中山大学，广东省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来往函件均署名“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金起元”⁷⁶⁾，只是1945年韩国光复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确有驻广东的机构，但是其名称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驻华南办事处”。⁷⁷⁾韩国独立

73) 《广东省会公安局关于金孝淑案原呈一件》，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74) 参见《朝鲜中央日报》1935年11月4日。

75) 国家报勋处编《独立有功者证言资料集Ⅱ 金贞淑》2002年12月30日发行，第18页。

76) 《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金起元致中山大学校长函》1933年8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党广东支部的主要活动是为中山大学的韩国留学生入读提供便利和经济援助,因此,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还商定了中山大学和广东军官学校为韩国独立运动培养200名韩国革命青年的计划。⁷⁸⁾ 据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金起元致函校长邹鲁谓:“贵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与鄙党内约人才养成案,并先生内诺中山大学收容案等在案。今者,民国二十二年度上学期学生,自上海鄙党理事会负责送来,兹别纸学生名单及履历书,志愿院系详记,呈请校长先生特许取录,以便鄙党之革命人才养成工作,则不仅为鄙党之光荣,也为全民族之幸甚!但关于实际入学节次手续,则与鄙当特委之管西南学生事宜兼贵校委任韩国学生事宜之助教具益均军秘密商量为荷。”⁷⁹⁾ 因此,曾经有相当数量的韩国留学生参与了韩国独立党。

但是,随着朝鲜民族革命党势力的扩展,韩国独立党在广东的势力却越来越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韩国独立党思想较为保守,甚至将韩国留学生组织的抗日游行示威活动视为思想不健全的“反动行为”⁸⁰⁾,与民族革命党的激进左翼思想更容易吸引青年相比,因而在韩国留学生中逐渐丧失了影响力。甚至连当时担任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金起元的女儿金孝淑也加入了朝鲜民族革命党。如金孝淑一案,其父亲金起元不仅不支持其女儿金孝淑参加广州学生抗日示威活动,而且还指责其思想激进,且以手枪失窃为理由向广东省公安局提出控告,要求将其女儿投入感化院教育。以至于朝鲜民族革命党广东支部中山大学指导员李贞浩也向中国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控告指责金起元诬陷其女儿金孝淑,据载“中山大学助教李贞浩,学生李苏民等呈:为金起元见利忘义,诬其女孝淑反动,致为公安

77)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驻华南办事处公函》驻南字第27号,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3)。

78) 具益均,前揭书,第141-142页。

79) 《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金起元致校长邹鲁函》1933年8月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80)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训令》注字第12号,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局拘押。”⁸¹⁾后经中山大学法学院呈请校长邹鲁保释,金孝淑等为广东省公安局释放。

此外,韩国独立党在广东制造了一起申永石间谍嫌疑案,对韩国独立党的信誉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华南地区形势也十分紧张,日本间谍活动也十分频繁。有的韩国留学生为生活所迫,接受广州私人聘请教授日文,如1934年,中大农学院一年级韩国留学生申永石不愿加入韩国留学生反日团体,而且还教授日语所谓“敌国”语言赚钱,激起韩国留学生普遍不满,时任法学院助教具益均动员其加入留粤韩人革命团体,申永石以“因见各团体多有名无实,并非实际干革命工作,不允参加。”⁸²⁾且责骂助教具益均。因此,申永石遭到韩国留学生同胞的殴打,具益均并向校方举报申永石为日本间谍,导致申永石不仅被开除学籍,而且被广州警备司令部拘押。然而申永石的中国同学多不相信申永石是间谍,纷纷联名上书校长邹鲁,要求查清此案,还申永石清白。邹鲁十分重视,亲自致函江西省政府和武汉大学以及南京航空学校,调查申永石来往接触的人员是否有间谍嫌疑,结果一一加以否定,申永石也不断上书校长辨诬。中山大学终于平反了申永石间谍冤案,恢复了申永石的学籍,并将诬告申永石的助教具益均革职。⁸³⁾具益均不久前往上海,为日本警察拘留,并被押解汉城处刑。可见,由于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的有关领导人因政治立场不同或信仰差别,对韩国同胞进行人格诬陷,以致酿成申永石间谍冤案,因而影响了其在广东韩人中的声誉。

(3) 韩国国民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

由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主导的韩国国民党于1935年1月成立。 韩国

81)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训令》注字第12号,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82) 《广州警备司令部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密函》法字第256号,广东省档案馆,全宗20(2)。

83) 同上。

国民党具有较为成熟的革命纲领,其党纲以三均主义为政治理念,主张通过武装革命的手段收复国土和恢复国家主权,建立以政治,经济和教育机会均等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因此,韩国国民党积极展开恢复国家主权的理论宣传,并主张实现韩民族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以武装革命的手段实现民族独立。因此,韩国国民党是所有韩国独立运动政党和团体中较为成熟和组织健全的政党。韩国国民党一成立,就开始谋求在广东地区势力的发展。原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金起元担任韩国国民党理事兼驻广东代表。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韩国国民党先后把朴昌世,赵素昂派到广东,专门为韩国国民党筹措资金和发展党员。1936年前后,金九的参谋安恭根的长子安偶生和金九的长子金仁,还有李海平,韩道明等被派遣到广东。其中安偶生在二十年代,曾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学习,经金九推荐,其再次入读中山大学文学院。韩国留学生李兴官曾以韩国高丽兴学会驻粤办事处的名义担保其“品行端正,为韩国建国人才,免学费及杂费。”⁸⁴⁾于1934年入学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但由于违反校规被革除,后经金九保荐入读南京军校毕业,又经金九推荐重返中山大学入读,并成为韩国国民党在广东地区的活动骨干。

韩国国民党在广东地区的独立活动,主要是首先建立韩国国民党广东支部,健全广东地方基层组织。安偶生等人在中山大学韩国学生也是金起元之子金德穆等的协助下,将已经加入朝鲜民族革命党的韩泰宙,安炳武和金昌满动员加入韩国国民党,从而正式组成了韩国国民党广东支部。其次,组织韩国青年前卫团,作为韩国国民党在广东的外围团体。1937年2月,为了发展在广东地区韩国国民党的势力,中山大学组织了以金昌满为团长的韩国青年前卫团,有20名左右团员,其中还包括了原朝鲜民族革命党中支持临时政府的人员。⁸⁵⁾在1937年9月,他们全部合并加入了韩国国

84) 《韩国高丽兴学会驻粤办事处函》,1932年9月29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85) 《1939年的在支不逞朝鲜人的不稳策动状态》,金正明编《朝鲜独立运动Ⅱ》,第644页。

民党青年团。此外,韩国国民党还在广东地区发行鼓吹独立运动的机关杂志《前线》,共出版发行了四期,发行到4月号即停止。

由于韩国国民党具有较为成熟的党纲和独立运动理念,又积极注重在广东地区的青年学生中发展势力,而且,其组织工作和资金募集均比朝鲜民族革命党具有更多的优势,尤其是在左右翼合作和民族联合思想的指导下,韩国国民党在广东的独立活动也非常活跃,因而在广东地区韩人独立运动团体中影响不断扩大。因此,在1936年9月前后,金九派韩国国民党在华南地区的所有韩国独立革命团体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4)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向广州的移动及其关于遣返韩侨的交涉

1938年7月,由于日军对长沙的进攻,在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安排下,韩国临时政府于1938年7月迁移到广州,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的热烈欢迎。韩国临时政府直到1938年10月离开广东,广东省政府在政治,财政以及交通安排等方面一直给予韩国临时政府以积极的支持和配合,广东国民政府还拨出东山区东山湖附近的私人官邸园林,作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广州办公的政厅。1938年10月,由于日军对广州的进攻,韩国临时政府在广东省政府的安排下一度迁移到广东省佛山市办公,后又迁移到广西柳州。

随着1945年8月韩国光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专门成立了驻华南办事处,并积极与广东省政府协调处理韩国流亡在广东的侨民问题。1947年1月,广东省政府代电:“各县市政府管理局长: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特派驻华南办事处,本年十月十八日驻南字第四号公函,以韩国侨民前被日军强编来华,迫充苦役,流落各地,生活窘急者为数不少。本处奉令成立,协同办理此项救济难侨工作,请转令各县市代为设法遣送来穗,对于旅途中交通,日给,尤盼指导及予以一切便利等由,仰即遵照查明办理。主席:罗卓英,厅长:李扬敬。”⁸⁶⁾遣送韩国侨民归国,是广东省政府的一项

86) 《转饬查明流落韩侨设法遣送来穗由广东省政府代电》,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2),卷99。

重要工作，广东省政府为此专门拨出财政款项救济散落在广东各地的韩国侨民，并与韩国临时政府积极配合协调，圆满的完成了广东地区遣返韩国侨民的任务。

结束语

从1921年9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遣申奎植访问广州护法政府，迄1945年8月韩国光复后广东省政府协助韩国临时政府遣返韩侨，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中国广东地区也展开了波澜壮阔的韩国独立运动。随着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国民革命，广东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中心和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也成为东方被压迫民族进行民族独立运动的基地。韩国独立运动的志士千里迢迢来到广州，不仅接受了中国民主大革命的洗礼，而且，他们自觉的把韩国独立运动的伟大事业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洪流。因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地区的韩国独立运动具有中韩联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从而构成了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基本特征。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其主要独立运动的方略是通过出席远东太平洋会议等外交手段，以谋求实现韩国独立的目标。然而，在严酷的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前，通过外交手段和平实现，显然无法实现国家独立的理想。因此，申奎植的广州访问，虽然实现了与广州护法政府的外交承认，但是，试图通过参加太平洋会议，实现韩国独立的目标仍然无法实现。以金元凤，孙斗焕为代表的独立运动的志士，通过在广州组织独立运动团体和政党的形式，以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为中心积极展开在广东的独立活动，并为韩国独立革命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使广东地区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人才养成基地和中国华南地区独立运动的中心。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独立运动在广东地区大体经历了由大韩民

国临时政府和韩国民间政党,团体先后主导独立运动进展的过程,其独立运动的理念和目标手段,也完成了由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初期,幻想通过和平外交手段实现国家独立,到采取武装革命的手段实现国家独立的转型。虽然在广州的韩国各个革命政党,团体之间由于独立运动理念和政治信仰的差异也发生过矛盾和纠葛,但是,广东地区独立运动主要政党和团体的领导人最后均体认到只有实现民族大联合,建立广泛的统一的独立运动政党才能增强独立运动的力量。由于韩国国民党具有较为成熟的党纲和独立运动的斗争理念以及健全的组织工作,因此,三十年代末,广东地区朝鲜民族革命党党员纷纷加入金九派韩国国民党,从而,实现了以金元凤为首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与金九派韩国国民党党员在广州初步的联合,也使金九派韩国国民党在三十年代末,基本上主导了广东地区的韩国独立运动的格局。

1938年7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南迁广州,进一步推动了广东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也积极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在广州的活动。随着1945年8月韩国光复,广东省政府与韩国临时政府积极协调配合,顺利完成了广东地区遣返韩侨难民的工作,为广东地区的韩国独立运动化上了圆满的句号。

附：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韩国国民党驻粤代表金起元官邸与韩国临时政府在广州政厅遗迹地考：

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和后来韩国国民党驻粤代表金起元的官邸。据广东省档案馆收藏《国立中山大学历届韩籍毕业生调查表》载，⁸⁷⁾中金贞淑，金孝淑，徐尚虎，金德穆等，其保证人一栏，明确记载“广州东山西牛尾福音村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而韩籍毕业生宋冕秀，其通讯地址一栏也明确说明是“广州东山西牛尾福音村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这是因为宋冕秀与金起元的女儿金孝淑为恋人的关系。1933年1月15日，金起元致函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其落款处也明确署明其住址是“广州市东山西牛尾福音村”。⁸⁸⁾那么，作为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的“广州东山西牛尾福音村”现在广州何处？笔者查证1976年12月广州市公安局编撰的《广州市街道名册》，其248页记载“福音东，属东山分局农林派出所”，其备考一栏，注明“已更名福今东”。又据《广州市地名志》载：所谓“福音”是“1937年建教堂宣讲福音，故名。1968年，改名福今路”⁸⁹⁾所谓“西牛尾”，显然是“犀牛尾”之误，经笔者寻访犀牛尾村居民，均称所谓西牛尾福音村，即今福今路，而犀牛尾村其地点在今广州市农林下路北端农林下路小学附近。

然而，据广东省档案馆收藏1936年3月《国民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训令》注字第12号关于金孝淑案件的批文，不论是金起元控告其女儿的状况，还是金孝淑的供词，又署名其住址是“河南小港路嘉密园11号”⁹⁰⁾。案：1935年1月，韩国国民党成立，金起元已经担任韩国国民党驻粤代表，

87) 《国立中山大学历届韩籍毕业生调查表》，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88) 《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金起元致校长邹鲁函》1933年1月1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89) 《广州市地名志》，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广州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主编，香港大道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6月版，第82页。

90)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训令》注字第12号，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20(2)。

其居所应该已经搬离原“广州东山西牛尾福音村”，转而迁移到“河南小港路嘉密园11号”。所谓“河南”，是广州人对珠江南边的通称，并非在今天中国河南省。按照今天广州市地图，“河南”的地理位置是广州市海珠区，而小港路则位于海珠区北侧珠江南岸。今小港路名称尚存，然小港路嘉密园11号，已无从寻觅矣。

又，据韩国国家报勋处编《独立有功者证言资料集Ⅱ》金贞淑回忆：其父亲金起元在广州的住宅位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官邸附近，而临时政府的官邸位于现东山公园附近，旧称“莲花池”的地方。⁹¹⁾今考广州市东山公园，现称“东山湖公园”，三、四十年代原为珠江连接大沙头的河涌，五十年代，广州市政府整治珠江，以人工开挖河涌，形成今东山湖公园。据笔者访问当地老人，其地确有“莲花池”一说，然今天已成为东山湖的一部分。据笔者实地勘察，东山区的小别墅以东山新河浦路和恤孤院路，为主要集中地段，建筑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新河浦，龟岗一带，这些高高低低的复式小别墅有600多栋，是广州现存最大的中西合璧低层院落式传统民居群。据附近居民回忆：当时新河浦路一带的环境非常具有诗意，房子周围乔木高大，绿荫掩映，门前是潺潺流水，可通机动船，涌边有一个茨菇塘（莲花塘？），不远处还有码头和广九车站，交通便利。

据考证，广州市东山区，直到清朝都是广州城郊。民国30年(1941年)《广州概览》中记载：“东山本为郊外一村落，以广九铁路经此入世，欧美侨民，有的在铁路附近卜居者。民国以来，建筑西式房舍者日众，遂成富丽之区。”据载，自大清宣统3年(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后，外国人和本地富商在东山择地大建住宅，才使“地价日境，屋宇日盛”。民国时期的军政，官僚也因为此地交通便利，环境清幽，也纷纷在此兴建别墅，官邸，由此形成了以新河浦路，恤孤院路为集中地的花园式住宅。

东山区小别墅的建筑风格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园别墅，别墅前后

91) 国家报勋处编《独立有功者证言资料集Ⅱ金贞淑》2002年12月30日发行，第101页。

有庭院；另一种为线条简洁的洋楼，红砖外墙，装饰线条简洁，主楼前一般没有庭院，人居密度大。在设计形式上，多吸取西洋风格，形态各异，多有柱式门廊；规模也各不相同，有单家独户的大宅院，也有公寓型洋楼。民国元老谭延闿，廖仲恺和汪精卫等以及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和中共主要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官邸也位于这一带，现尚存春原，简园，葵园，明园等园林官邸。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938年7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移到广州，广东省政府专门拨出东山区柏园官邸作为临时政府的政厅官邸。根据金贞淑的回忆，临时政府官邸位于其住宅附近。⁹²⁾然而，1938年7月，临时政府南迁广州时，金起元的住宅已经搬离东山区福今路犀牛尾村，显然，金贞淑回忆的时间有误。不过，金起元担任韩国独立党广东支部长时在东山区福今路的住宅，其地理位置恰好与新河浦路这一带的官邸园林相距不远。因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广州的官邸政厅，应该就是现在广州市东山区新河浦路现存数十座民国时期的官邸园林之一，而柏园究竟是那一座官邸，尚需进一步查考。

92) 韩国国家报勋处编《独立有功者证言资料集Ⅱ金贞淑》，2002年12月30日发行，第101—102页。